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台灣音樂研究的學科史初探（一）： 日治時期日人對台灣音樂的記錄與保存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2-069

執行期間：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王櫻芬（nanguanl@ccms.ntu.edu.tw）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台灣音樂研究的學科史初探（一）： 日治時期日人對台灣音樂的記錄與保存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2-069

執行期限：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主持人：王櫻芬 國立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李毓芳（專任研究助理）

一、中文摘要

學科史的研究是近年來國際間一股重要的研究潮流，然而臺灣音樂學界對自身學科發展史的研究卻仍處於剛起步的階段，因此本計畫以日治時期兩位日本音樂學者——田邊尚雄和黑澤隆朝分別在1922及1943年於台灣所進行的音樂調查為研究對象，試圖重建其調查過程、評估其調查成果，並分析他們進行調查的動機、目的、所抱持的學術觀念和意識型態，以及與當時日台政治環境及國際音樂學界學術思潮的互動。

經由文獻資料的整理，我們可以發現田邊和黑澤的調查為當時的台灣音樂生活留下了極為寶貴的資料，尤以黑澤的調查更為廣泛而深入，包括了大規模的原住民音樂調查、各種漢人音樂、唱片工業和廣播節目等等。他們對於當時台灣的音樂界人士、音樂生活以及音樂觀念等諸多面向的描寫，也提供我們許多值得繼續探討的線索。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音樂調查活動與日本的殖民政治有密切關連。日本的帝國殖民主義不但促成了田邊和黑澤的台灣音樂調查，也為他們的調查提供了重要的經費來源和行政支援。而他們的調查則是為了尋找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源，並為殖民統治政策的制定提供基本資料。他們所提出的研究成果和音樂觀念往往有意或無意地為日本在亞洲的擴張提供了良好的藉口和說詞。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音樂研究與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密切關連。

另外，田邊和黑澤所關心的學術課題，例如對於音樂起源問題的重視，反映出他們受到當時歐洲比較音樂學的影響。從這裡我們也可得知當時日本音樂學界接觸歐洲音樂學研究潮流的情形。

關鍵詞：

田邊尚雄、黑澤隆朝、台灣音樂學學科史、日本殖民帝國主義、日治時期台灣音樂生活

Abstract

Since at the least the 1980s, various disciplin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have begun to reflect critically on their respective disciplinary hist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Among Taiwanese musicologists, however, a study of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music research in Taiwan has barely started. In view of this gap, this project takes the Japanese period, which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usicological activities in Taiwan, as its time range and focuses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Japanese musicologists in Taiwan, namely Tanabe Hisao's pioneering fieldwork in Taiwan in 1922 and Kurosawa Takatomo's comprehensive fieldwork in Taiwan in 1943.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reconstruct their processes of investigation, to reevaluate their achievements, to analyze their motivation, purposes, and ide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to underst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aiwan and Japan and the musicological thinking in the west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A study of Tanabe's and Kurosawa's materials shows that both of them have left us with invaluable documentation of the musical life in Taiwan during the time of their fieldwork. While Tanabe is important because he was the first musicologist to carry out fieldwork and recording activities on Taiwan's music, Kurosawa was even more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music he has documented. He not only made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aboriginal music, but he also left us with information and recordings of the music of the Han people. Moreover, his field diary also contains many notes about various aspects of musical life in Taiwan in 1943, including the record industry, broadcasting programs, Taiwanese geisha activities, etc. Similar description also appear in Tanabe's field diary.

In this study, it has also become clear that Tanabe's and Kurosawa's research activiti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lonial management policy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Japan's imperial colonialism provided the economic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basis for their fieldwork in Taiwan. Meanwhile their investigation is motivated by the search for the roots of Japanese race, and to provide basic data in order to facilitate colonial management by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heir Taiwan. Their research results often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provided good excuse and rationale for the expansion of Japan's military power in Asia. Thus we can see the clear

connection between music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both Tanabe and Kurosawa were apparently influenced by the way of thinking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musicologists. One good example is Kurosawa's persistent interest and concern in quest of the origin of music. From here, we can also get a glimpse of the reception of European musicological studies in Japan's musicological circle during that period.

Keywords:

Tanabe Hisao, Kurosawa Takatomo,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musicology in Taiwan, Japan's imperial colonialism, Taiwan's music lif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二、緣由與目的

音樂學者進行台灣音樂的調查研究始於日治時期（1895-1945），而其中又以田邊尚雄（1883-1984）及黑澤隆朝（1895-1987）最為重要。他們兩位都曾進行台灣音樂的錄音、採譜，並出版田野報告、專書、以及唱片，為日治時期的台灣音樂生活留下寶貴的記錄。

雖然這兩位學者如此重要，但是目前為止台灣學界甚少有人對他們的調查活動及成果進行深入的探討。至於日本方面，自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便有數位音樂學界的新起之秀對於田邊和黑澤在朝鮮、中國、及東南亞的調查進行細緻而具有批判性的深入研究，並指出他們的調查活動與當時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的密切關係（細川 1992；植村 1997a, 1997b, 2000；梅田 1997；Hosokawa 1998；渡邊 1999）。不過在這些著作中，卻很少提到有關台灣的部分。

近二十五年來，在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的衝擊下，國際學界紛紛興起一股研究自身學科歷史的熱潮。他們不但回顧自身學科的發展過程，並將此發展過程置於歷史和文化的脈絡中，試圖了解學術研究與歷史文化的互動關係，並進一步剖析和反省過去的研究方法和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參見 Nettl 1991:xi）。

歐美音樂學界在這方面雖然較其他學科起步得晚，但是至今已累積了相當的成果，例如美國民族音樂學界在九〇年代中便出版了數本有關學科史的文集（如 Nettl and Bohlman 1991；Blum, Bohlman and Neuman 1991）。美國歷史音樂學界在一九八〇、九〇年代對其學科歷史中的強烈實證主義色彩已展開了一連串的批判和反思（Kerman 1985；Bergeron and Bohlman eds. 1992；Swarz et al. eds. 1997；Cook and Everist eds. 1999），而 Potter（1998）更對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德國音樂學界在希特勒政權控制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嚴厲的批判精神，為音樂學的學科史研究樹立了新的典範和指標。

另外，中國音樂學界自 80 年代至今已有數位

學者對於學科研究方法及學科史的發展過程進行了回顧和省思（如沈洽 1990；喬建中 1990；王耀華 1999），自 1987 年創刊至今的《中國音樂年鑑》也對每年的音樂學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檢討，而在 1999 年底舉辦的「紀念楊蔭瀏先生誕辰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更對楊蔭瀏及其研究做了多面向甚至具有批判性的探討（參見《中國音樂學》1999 年第 4 期及 2000 年第 1 期中的選文）。

相較於國際音樂學界的反思熱潮，台灣音樂學界對自身學科發展史的研究則還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有鑑於此，本計畫以田邊尚雄和黑澤隆朝在台的音樂調查為對象來進行探討，以作為重建台灣音樂研究學科史的初步工作。本計畫除回顧其調查過程及成果之外，並進一步探討他們進行調查的動機、目的、經費來源、所抱持的學術觀念和意識形態，以及與當時日台政治環境及國際音樂學界學術思潮的互動關係。

三、結果與討論

（一）田邊尚雄的台灣音樂調查（1922）

田邊尚雄來台調查的時間是大正十一年（1922）四月一日至二十一日，距 1895 年日本開始接管台灣已歷經將近三十年之久的時間。此時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已經步上軌道，基本建設已大抵完成，1910-1904 年的五年理番計畫也已經使得大多數的原住民族群趨於歸順。台灣此時已經是一個近代化的社會，而此時的日本更已經躍居世界列強之一，正積極準備向外擴張。

處於這樣環境下的田邊，幸運地獲得了日本啟明會（一個活躍於殖民地研究的私人基金會）的優渥補助，於 1921 年至 1923 年進行了以日本殖民地為主的一系列調查活動，包括朝鮮（1921）、台灣（1922）、沖繩（1922）、中國（1923）、樺太（1923），以及日本境內幾個小島（詳見東洋音樂學會編 1969：123-28）。

田邊到台灣來的主要目的是調查泰雅族出草（獵首）的音樂舞蹈。根據田邊的唱片解說，泰雅族薩拉矛蕃於大正十年襲擊了日本警官家族，日軍率霧社蕃（屬泰雅族的另一支）大舉討伐，取得了薩拉矛蕃二十五個首級，田邊在日本內地的報紙上看到這則報導，想要來台採集泰雅族出草的音樂舞蹈，否則一旦泰雅族被日人平服，出草的音樂舞蹈將會隨著出草習俗的被禁而消失。

除了調查出草的音樂之外，田邊更深一層的目的是為了要透過台灣原住民音樂尋找日本古代音樂的根源。自 1890 年代開始，日本歷史學界便開始熱衷探討日本民族的起源問題；其中一派的說法認為日本祖先是來自阿爾泰語系的北方民族，另一派則認為是來自馬來玻里尼西亞的南島語族，也有人認為是兩者兼具（詳見 Tanaka 1997: 69-77）。由於台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系，所以田邊希望透過台灣原住民的音樂，探索日本古代音樂與馬來人音樂的關係。必須注意的是，日本學界的尋根熱潮一直

持續到一九四〇年代前期，並且逐漸成為日本宣稱東亞同源的理論根據，最終演變為日本南進的藉口（參見 Tanaka 1997; Hosokawa 1998）。

由於進入泰雅族的深山進行田野調查極為危險，因此田邊向當時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請求支援。由於田總督的哥哥正好是田邊父親的好友，再加上台灣總督府自日治初期便持續進行台灣舊慣調查，以作為制定殖民政策的基礎，而田總督作為台灣第一位文官總督，對於台灣地方志的編纂又特別有心，因此在田總督的諭令之下，田邊得到總督府、地方官員警察的全力支持，此外，一條慎三郎、橫田四郎、張福興等師範學校音樂老師更給予他許多協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張福興在同一年（亦即 1922 年）的二月至三月間才在日月潭附近進行了近半個月的邵族音樂調查（參見陳郁秀、孫芝君 2000：131），因此張福興在田邊出發前往山地之前還曾面授機宜，提供注意事項。

在官方和日籍音樂教師的協助和陪同之下，田邊的台灣之行雖然只有短短二十天（四月一日至二十一日），但是卻順利而充實。田邊在台的前面八天調查了中部山區的泰雅族霧社番、日月潭附近的邵族、以及南部的排灣社，不但錄了音，也拜訪了番童學校和傳統住屋。其餘的時間，田邊調查了台南孔廟的樂器、看到了台南媽祖祭陣頭遊街的盛況、在數場宴席中欣賞了日本藝妓及台灣藝旦的演出、參觀了藝旦間、也看了桃園天樂社在台灣新劇場（舊名淡水劇場）的演出，不過這些活動田邊都沒有進行錄音。此外，田邊還發表了數次演講，並舉辦了台灣史上第一場唱片音樂會。除此之外，田邊並在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之間前往廈門調查南管音樂，因為他認為南管與日本古代宮廷音樂如催馬樂朗詠有相似之處。在此，我們再度看到田邊對於找尋日本音樂文化根源的重視。

由上面的行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田邊的主要目的雖是調查原住民音樂，但是他花在調查原住民音樂的時間其實只佔了他在台行程中的八天，其餘十二天則多是從事與漢人音樂或與講演、社交有關的活動。至於原住民部份，田邊只調查了三族，而且每一族都只調查了其中一或兩社，可說只是蜻蜓點水。過去台灣學界提到田邊，只提到他作原住民音樂的調查，卻往往忽略他其他部份的活動。事實上，田邊雖然只錄了原住民的音樂，但是他田野報告中卻有許多有關漢人音樂、日人在台音樂活動、藝妓、藝旦等生動描寫，提供了 1922 年台灣音樂生活的寶貴資料，為當時與音樂相關的人、地、事、物留下了許多蛛絲馬跡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深究。

由於田邊的調查報告詳細地記錄了他的調查過程和當時的感想，因此對於我們了解他的心態也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線索。比如說，關於泰雅族的音樂，他認為這些「生蕃」的音樂單純，沒有矯飾，卻能表現出人格和內在的精神。反之，他認為日月潭附近「化蕃」邵族的音樂已經觀光化，雖然徒有技巧，卻只是遊戲，已失去真正的精神。此外，他看到泰雅族人以唱歌對答的情景，更讓他連想到日本《古事記》中有關日本古代音樂的描寫。雖然田

邊對於泰雅族的純真如此讚揚，但是，在提到番童學校時，田邊卻又對日本殖民教育給予正面的肯定。例如，他提到當他看到原住民孩子可以以流利正確的日語回答問題，可以在沒有樂器伴奏下正確的唱出日本國歌，他不禁驚嘆於他們「文明化」的程度，甚至覺得「他們與我們就是同一人種」。

從田邊在調查報告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他對於蕃人及其音樂的讚美，以及一再強調蕃人與日人的同源同宗，也指出日人比漢人的優越。同時他卻又肯定日人對於蕃人的教化。這種將日本殖民統治視為提高被殖民者文明水準的心態，以及對於被殖民者與日本同種的一再強調，都反應出田邊對於日本帝國殖民主義的認同，也成為田邊日後支持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口號的前奏（見下文）。

此外，田邊對於純樸、具有人性的音樂的推崇，也可見諸於他以「音樂的文化使命」為題的演講中。在《台灣日日新報》所轉載的講稿中（1922 年四月四日至六日），田邊引述孔子的樂教理念，強調音樂的教化功能。這個講題在 1924 年擴充為《現代人・生活・音樂》一書。在該書中，田邊不但將樂教思想做更清楚的闡述，也在書中提到日本雅樂乃是集亞洲音樂文化之大成（見田邊 1960：53-55）。到了四〇年代，日本高呼「大東亞共榮圈」口號來作為南進的藉口，而田邊在配合日方政策下，將上述的論點做了更大的發揮。在他的《大東亞・音樂》（1943）一書中，田邊再次以東亞音樂的單純而富有神性，相對於西方音樂的複雜而徒具技巧，作為東亞音樂優於西方音樂的理由（在此，東亞音樂事實上涵蓋了所有的亞洲音樂）（見前引書：12-17）。在田邊編輯的唱片《東亞・音樂》的解說當中（1941），他更提出日本音樂不但集亞洲音樂之大成，更是集世界音樂之大成，因此日本音樂不但是亞洲之最，也是世界之最。由於日本文化的優越，因此日本人有責任將亞洲自西方人手中解放出來，重建「東亞新秩序」。這正是日本在四〇年代發動太平洋戰爭時所用的說詞，而田邊此時的著作明顯地是為日本帝國殖民主義而服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些說法，似乎早在 1920 年代就已經有其軌跡可循。

（二）黑澤隆朝與台灣民族音樂調查團（1943）

日本在 1937 年發動蘆溝橋事變後，便開始進入戰時體制，而台灣也跟著進入第三期的殖民統治時期，總督一律由武官擔任，強制執行皇民化運動。到了 1941 年太平洋戰爭後，台灣實施禁鼓樂，禁止音樂戲曲活動，只許某些劇團演出皇民劇，作為政治宣傳工具。

1943 年（昭和十八年），在台灣總督府的邀請下，日本勝利唱片屬下的「南方音樂文化研究所」組成「台灣民族音樂調查團」，由耕源次郎任團長，黑澤隆朝負責音樂調查，率領錄音工程師，並配合台灣在地的調查班，進行台灣民族音樂的調查、錄音、和紀錄片拍攝。該調查團分兩隊赴台，第一隊於該年一月二十二日抵台，第二隊於一月二十六日抵台，兩隊同於該年五月八日離台。黑澤隨第二隊

赴台。

該調查團在官方的行政及財力支持下，在短短三個月間完成了許多工作，包括環島兩次的調查、數次的錄音室錄音，並拍攝紀錄片，調查的對象包括原住民和漢族音樂兩方面。

原住民方面，該調查團走訪了具有代表性的二十二個番社，涵蓋了幾乎所有的台灣原住民族群（但不包括雅美族和平埔族）。此外，按照總督府理番課的囑咐，發出了五百張的調查票，讓在地調查者就原住民樂器狀況填寫，共計一百五十五社。據筆者所知，這樣的普查應該是空前絕後，即使其中有些資料可能不盡確實，仍為台灣原住民的音樂留下寶貴的歷史資料。

漢族方面，該調查團錄了多種漢族音樂，包括台南孔廟音樂、十三音、佛教道教音樂、南管、小曲、皮影戲音樂（詳見黑澤 1973：472 所列的唱片曲目）。此外，唱片工業、廣播節目，也都是該調查團的調查對象。因此我們看到黑澤在調查日記中提到訪問古倫美亞唱片的柏野正二郎，也數次記錄廣播電台的節目內容。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台南孔廟音樂。台南孔廟自 1939 年起就已廢止孔廟祭典，改為神社祭典，因此當黑澤要求錄孔廟祭典時，原本遭到台南市長的拒絕。經過數次協調，終於在 1943 年三月二十七日舉行私祭。據黑澤描述，當天許多台南仕紳都集合在廟外聆聽久已未聞的「聖樂」。兩天後，黑澤在「聖樂錄音試聽會」中發表演講，援引孔子的禮樂說，在場台灣人深有同感，希望能復活古樂，但遭當局否決。由這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出黑澤如田邊一樣也深受孔子禮樂之說的影響。有趣的是，三月二十八日《台灣日日新報》出現了有關聖樂錄音的報導，但是其中卻是以東亞古樂文化的復活來解釋，充分顯示了日本官方強調孔子禮樂為東亞共同古典文化的立場，這種說詞正是日本當時用來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口號的藉口。

該調查團在五月好不容易逃過美軍潛水艇的轟炸，安全返回日本後，在該年十二月完成「台灣民族音樂」二十六張十吋 SP 唱片，並由耕源次郎監製完成電影「台灣 音樂」十卷。可惜兩者都在發表及試映後便遭美軍空襲摧毀，其他如底片、樂器、田野日記等也有所損失。所幸黑澤在家中還保有編輯用的唱片一套，後來有複製出版（日本勝利，二十六張二十五公分 SP 唱片）。

由於當時的局勢緊張，因此黑澤原本計畫要寫的調查報告書也並未完成。幸好黑澤在 1973 年終於將他對於台灣原住民音樂的調查和研究成果寫成了一部長達五百多頁的巨著，在該書附錄中附上了他在台灣的調查日記，讓我們得以了解他的調查過程及當時的心態。該調查日記充分反映出當時台灣的音樂生活、社會狀態、以及當時黑澤所接觸到的許多人事物（包括呂泉生等），也觸及當時有關傳統與創新的爭辯及做法、當時日本警察對於原住民音樂的態度、日本在戰時所推行的「絕對音感教育」等等，有許多非常有趣的蛛絲馬跡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在這裡筆者想要探討一個有趣的問題，也就是

為什麼台灣總督府在風聲鶴唳的戰爭期間，要特別邀請日本方面組團調查台灣民族音樂，尤其當時台灣又處於全面實施皇民化運動和禁鼓樂的時期？

黑澤的書中對於此點並沒有任何解釋。不過在 1943 年一月三十一日的台灣日日新報有一則關於此調查團的詳細報導。該則報導中不但明確指出該調查團的任務並非只是為了建設台灣的音樂文化政策，而是為了整個大東亞共榮圈的新文化建設所作的調查。該報並列出該調查團的具體調查目標。由所列目標看來，該調查團是以台灣整體的音樂文化、樂器、藝能作為對象，要了解音樂藝能與教化、教育、娛樂、祭儀等的關係，甚至還包括藝人的社會階層及生活狀態、唱片工業、廣播事業等等。由於該報是台灣總督府的官報，因此上述說法代表的是官方立場。

不過，在看了這則新聞報導後，仍不免有個疑問，就是為什麼台灣總督府會如此重視音樂，尤其是傳統音樂，而且願意在戰時財政緊縮的情況下花錢支持傳統音樂的調查，而不是將錢用來製作能提振士氣的軍歌或其他音樂？

黑澤在 1944 年出版的一篇文章〈大東亞民族音樂文化・性格〉中恰好提到了這個問題，並且為此問題提供了三個理由（見該文第七頁）。黑澤提出的第一個理由是，唯有將整個大東亞音樂都納入考慮之後所制定出來的民族政策，才能真正促進大東亞民族的融合，也才能確保「大東亞共榮圈」的實現。由此可知，「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是戰時進行傳統音樂調查的一個重要的正當理由，因為以調查研究作為制定殖民政策之基礎正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一貫做法。

黑澤提出的第二個理由是，日本音樂融合了亞洲的種種音樂，因此唯有當我們了解這些音樂之後，才有可能釐清日本音樂中哪些是外來的音樂元素，哪些是日本音樂古代的原貌。我們前面已經提過，尋求日本音樂的根源原本就是田邊 1920 年代來台從事音樂調查的重要動機，而對於人類音樂起源問題的探討更是黑澤著作中一再出現的重點，例如他 1953 年在國際民俗音樂學會（IFMC，後改名為國際傳統音樂學會 ICTM）所發表的有關布農族的論文，便是探討音階的發生與布農族弓琴的關係，而由他生平最後的著作《音階・發生・……音樂起源論（黑澤學說）》（1978）也可看出，音樂起源的問題正是他窮畢生之力試圖解決的一大命題。值得注意的是，田邊和黑澤對於音樂起源問題的重視，讓我們聯想到歐洲比較音樂學者的進化論觀點。事實上，田邊早在 1924 年便翻譯了比較音樂學者恩格（Carl Engel）的書《世界・樂器》，而黑澤的著作中更經常提到恩格、薩克斯（Curt Sachs）、瓦拉謝克（R. Wallascheck）等比較音樂學者的著作，由此可知田邊和黑澤應當都受到比較音樂學的影響，而比起田邊而言，比較音樂學對於黑澤的影響尤其明顯。

黑澤提出的第三點理由是，民族音樂的研究可以幫助日本派駐殖民地的官員了解如何欣賞和享受殖民地的音樂文化，而如果能夠喜歡或欣賞殖民地的音樂，這樣的殖民官便容易與被殖民者親近。

由此可知，黑澤認為音樂有助於人際關係的融和，而「和」原本就是孔子樂教思想中的主要精神，而且也是田邊 1920 年代的著作中就已經一再強調的觀念。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殖民政策的制定和日本民族文化的尋根，是日本音樂學者在戰時用來繼續從事東洋音樂調查研究的重要說詞。我們甚至可以說，唯有附和當時的國家政策，音樂學者們才能夠在戰時取得研究的資源。

至於黑澤在調查時對於台灣的人民和台灣音樂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黑澤對於原住民及其音樂顯然有極高的評價。他數度讚嘆原住民超人的聽覺、視覺、以及體能。他更驚嘆原住民音樂的多樣性，尤其是阿美族馬蘭社的自由對位、魯凱族的持續低音、及布農族的三度和聲（同前引書：494，496，500）。

但是正如田邊一樣，黑澤對於原住民的高度讚揚卻似乎仍不能讓他看到日本殖民統治的負面影響。反之，他在書中數次流露他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認同。

諷刺的是，田邊和黑澤都在書中提到基督教和觀光事業對於台灣原住民及其他東洋音樂和文化的破壞（見田邊 1968：4，黑澤 1973 自序：2），但是他們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對於這些文化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卻似乎都視而不見。

（三）總結

田邊和黑澤是在日治時期當中唯一兩位特別由日本來台進行音樂調查的音樂學者。雖然他們的台灣音樂調查中間相隔了二十一年，所處的時局也有很大的差異，但是我們卻發現他們的音樂調查活動都與日本的殖民政治有密切關連。一方面，日本的帝國殖民主義不但促成了田邊和黑澤的台灣音樂調查，也為他們的調查提供了重要的經費來源和行政支援。另一方面，他們的調查則是為了尋找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源，並為殖民統治政策的制定提供基本資料，而這兩個目的也正是當時日本許多學者共同的研究動機和目的（Hosokawa 1998：5）。從他們調查日記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們對待研究對象的態度不可避免地帶有殖民者對待被殖民者的心態，也可以看到他們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持有相當程度的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提出的研究成果和音樂觀念往往有意或無意地為日本在亞洲的擴張提供了良好的藉口和說詞。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音樂研究與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密切關連。

雖然如此，田邊和黑澤仍然為當時的台灣音樂生活留下了極為寶貴的資料。除了原住民音樂之外，他們對於漢人的音樂戲曲、藝妲文化、日人在台的音樂生活、「新臺灣音樂」（即以台灣樂器演奏西洋音樂，見黑澤 1973：478）、唱片工業、廣播節目、重要音樂界人士、音樂觀念、「禁鼓樂」、「絕對音感教育」等等，以及台灣生活的其他許多面相，都有相當生動的描述，值得我們循線繼續探討。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以田邊及黑澤所撰寫的調查日記、唱片解說、及其他著作為主，以當時台灣報紙對他們的調查所做的報導為輔，並參考前述日本學者對於他們的批判和研究，以及台灣美國日本學界對於當時日本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的相關研究，一方面對田邊和黑澤的調查過程及成果做了總整理，另一方面也析出他們的調查和日本帝國殖民主義的密切關係，以及他們在學術思想上所受到的當時歐洲比較音樂學的影響。

由於目前田邊尚雄和黑澤隆朝的手稿、田野資料，都已捐出，前者置於東京的國立劇場，後者置於東京的國立音樂大學。如果能對於其中有關台灣的部份進行研究，相信對於田邊和黑澤在台的音樂調查活動會有更深入而完整的了解。此外，本文並未對於黑澤所進行的錄音和採譜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評論。本人將繼續進行此部份的工作，希望完成後能對黑澤的調查成果作一更全面的評估。

五、參考文獻

中文：

- 陳郁秀、孫芝君. 2000. 《張福興——近代臺灣第一位音樂家》. 台北：時報出版。
鄧相揚. 1998. 《霧重雲深——霧社事件後，一個泰雅家庭的故事》. 台北：玉山社。
喬建中. 1990. 〈中國民族音樂十年〉，《人民音樂》4。
沈洽. 1990. 〈民族音樂學十年〉，《中國音樂年鑑》，頁 338-55。
王耀華. 1999. 〈中國大陸傳統音樂研究——五十年之回顧與思考〉，《音樂研究學報》8：85-95。
李筱峰、劉峰松. 1994. 《臺灣歷史閱覽》. 台北：自立晚報。

日文：

- 細川周平. 1992. 〈西洋音樂「日本化・大眾化」44〉，《「？」「？」「？」「？」》十一月號：164-69。
黑澤隆朝. 1973. 《台灣高砂族「音樂」》. 東京：雄山閣。
黑澤隆朝. 1944. 〈大東亞民族音樂文化「性格」〉，《音樂文化》2（9）：1-7。
黑澤隆朝. 1978. 《音階「發生」「音樂起源論（黑澤學說）」》. 東京：音樂之友社。
竹中信子. 1996. 《殖民地台灣「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 東京：田書店。
田邊尚雄. 1943. 《東亞「音樂」唱片解說》. Columbia（復刻為 CD, COCG-14342, 1997）。
田邊尚雄. 1943. 《大東亞「音樂」》. 東京：協和書房。
田邊尚雄. 1968. 《南洋·台灣·沖繩音樂紀行》. 東京：音樂之友社。
田邊尚雄. 1960. 《生活與音樂》. 台北：臺灣開明

- 書局。摘譯自氏著《現代人・生活・音樂》（1924，東京：文化生活研究會）。
- 田邊尚雄. 1981. 《田邊尚雄自敘傳》. 東京：邦樂社.
- 田邊尚雄. 1982. 《續田邊尚雄自敘傳》. 東京：邦樂社.
- 東洋音樂學會編. 1969. 〈田邊尚雄先生年譜・業績目錄〉. 《東洋音樂研究》 28/29 : 123-28.
- 植村幸生. 1997a. 〈植民地期朝鮮「宮廷音樂調查」田邊尚雄「朝鮮雅樂調查」政治的文脈〉《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35: 117-44.
- 植村幸生. 1997b. 〈田邊尚雄「東洋音樂」概念〉, 宣讀於國際「東地域新歷史表象——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對話」, 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 上越教育大學。
- 植村幸生. 2000. 〈田邊尚雄「朝鮮宮廷音樂調查(1921)」問〉, 《ExMusica》創刊號: 23-41。
- 梅田英春編. 1997. 〈黑澤隆朝東南音樂紀行〉. 東京：大空社.
- 渡邊裕. 1999. 〈音樂學・近代國家日本——田邊尚雄「場合」〉, 宣讀於 1999 年度日本音樂學會第 60 回全國大會.

西文：

- Becker, Judith. 1993. "A Brief Note on Turtles, Claptrap, and Ethnomusicology" (Call & Response), *Ethnomusicology* 35(3):393-6。
- Bergeron, Katherine, and Philip V. Bohlman, eds. 1992. *Disciplining Music: Musicology and Its Can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lum, Stephen, Philip V. Bohlman, and Daniel M. Neuman, eds. 1991. *Ethnomusicology and Modern Music Histo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Cook, Nicholas, and Mark Everist, eds. 1999. *Rethinking Mus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sokawa Shuhei. 1998. 'In Search of the Sound of Empire: Tanabe Hisao and the Foundation of Japanese Ethnomusicology,' *Japanese Studies* 18(1): 5-19.
- Kerman, Joseph. 1985. *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s to Music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rman, Joseph. 1991. "American Musicology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Musicology* 9: 31- 42.
- Nettl, Bruno. 1991. "Introduction," in *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Music*, eds. by Bruno Nettl and Philip Bohl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xi-xvii.
- Nettl, Bruno, and Philip Bohlman, eds. 1991. *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Music: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tter, Pamela M. 1998. *Most German of the Arts: Musicology and Society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End of Hitler's Reic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warz, David, Anahid Kassabian, and Lawrence Siegel, eds. 1997. *Keeping Score: Music, Disciplinarity, Cultur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Tanaka, Stefan. 1997.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